

17.4 4
YZQ

阎振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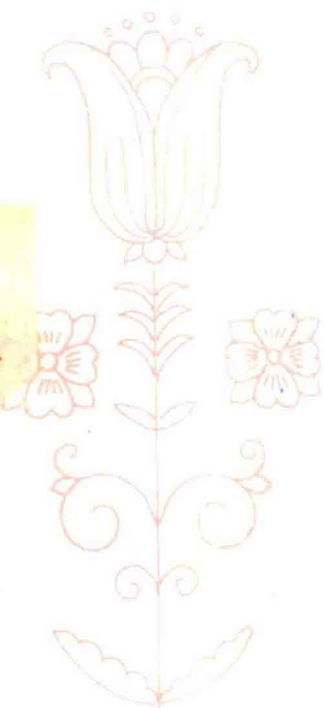


情侣夫妻之间

吉林人民出版社

17.4
YZG

不 朋 友
期



情侣夫妻之间
QINGLÜ FUQI ZHIJIAN

阎振起

人民出版社



Qinglu Fuqi Zhijian

情侣夫妻之间

阎振起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4.5印张 2插页 99,000字

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9,329册

统一书号：3091·499 定价：0.42元

目 录

摆正爱情的位置	(1)
切忌过早恋爱	(8)
选择恋人不能只看外表	(12)
权和钱不是爱情的基石	(17)
找对象不能只看经济条件	(23)
不必求“门当户对”	(28)
志同道合是爱情的基础	(32)
恋爱要讲文明礼貌	(37)
爱护贞操	(43)
爱情要专一	(47)
爱情要经得住考验	(57)
失恋不失志	(62)
切莫吞下包办买卖婚姻的苦果	(71)
爱情与婚礼仪式	(77)
夫妻之间的兴趣与爱好	(84)
婆媳相处，互敬互爱	(87)
夫妻共同的责任和义务	(91)
适时晚婚，计划生育	(103)
维护健康的婚姻生活	(113)
浅谈几个怎么办	
第三者闯入你的情网或你充当了第三者怎么办？	(121)
“一厢情愿”怎么办？	(123)
父母不同意怎么办？	(124)
写不好恋爱信怎么办？	(125)

两人因某些问题谈不拢怎么办? ..	(127)
爱人同其原来的恋人往来怎么办?	(128)
两地生活怎么办?	(130)
爱人身残或病重怎么办?	(131)
爱人不生育怎么办?	(133)
你所爱的人失足了怎么办?	(134)
附:	
傅雷给长子傅聪的信(摘录)	(136)
傅雷给次子傅敏的信(摘录)	(138)
后记	(141)

摆正爱情的位置

纯洁的爱情，是人们一种发自内心的对异性的最真挚的倾慕，是一种渴望对方成为自己终身伴侣的强烈的感情。歌德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一书中写道：“青年男子谁个不善钟情？妙龄女人谁个不善怀春？这是我们人性中之至圣至神，……”每个青年在他（她）人生的道路上，都要经过爱情的大门，都有获得爱情的权利。爱情在人生中，特别是对于热恋中的青年男女是美妙的，幸福的。但是，美妙的爱情能不能给人带来幸福，关键在于能否摆正爱情的位置，怎样使它犹如一架钢琴，发出高亢、壮美的旋律。

有些青年朋友，一听说要摆正位置就认为是老生常谈，政治说教。其实不然，它是解决恋爱、婚姻过程中一系列矛盾的根本出发点。摆正爱情的位置，顶重要的是要有无产阶级的爱情观。不同阶级，爱情的观点亦不同。封建阶级的包办婚姻无所谓爱情。所以，象钟鸣鼎食人家的贵族子弟贾宝玉，也只能“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妹寂寞林。”发出“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忘难平”的愤懑呼声。资产阶级则干脆撕下罩在爱情与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轻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纯粹的金钱关系。只要有钱，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会拜倒在五六十岁的老太婆的裙下；为了金钱父亲可以把十几岁

的女儿当作猎取交易所情报的诱饵。无产阶级的爱情，反对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爱情观，把革命目标一致、思想品德高尚作为爱情的基石。这种爱情使人们在革命征途上，能够互相激励，增强信心和勇气，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不息。

无产阶级的爱情观，是摆正爱情位置的重要思想基础。基础好，位置正，爱情不为金钱、地位、虚伪等习惯势力和陈腐观念所干扰，而是让爱情在志同道合的沃土上生根、开花、结果，并经受风风雨雨，永不凋谢。我们大家熟悉的马克思的夫人燕妮，在这方面给我们树立了楷模。燕妮出身于名门贵族，祖父担任过高级军职，父亲世袭男爵，身居高位。燕妮容貌漂亮，天资聪颖，才华出众。燕妮到了出嫁的年龄，追求她的人越来越多，有甜言蜜语的官吏，有显得温存周到的贵族青年，有百般殷勤的军官，也有风度翩翩的富家少爷。燕妮对这些献媚者自我得意炫耀的官位、爵衔、财产、金钱冷若冰霜，不屑一顾。她知道在这样利欲熏心的上流社会中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爱情。她对待爱情的思想观点，是不追求荣华富贵，而是寻求胸怀远大抱负，献身崇高正义事业的勇士，只有这样的人才是她的意中人。燕妮发现蕴藏在马克思心灵深处的人类真理，她与马克思有着共同的志趣，而且马克思经常与她热烈认真地讨论重大的人生问题。燕妮深深爱慕马克思的才华，敬佩他的理想，并把自己的终身完全托付给了这个普通律师家庭出身的马克思。马克思与燕妮的结合，是他们的思想感情、理想抱负和生活宗旨紧紧地联结在一起的结果。燕妮这样高贵的女子嫁给平民子弟马克思，长期遭到家庭和激烈的反对。但是，他们坚贞不渝地相爱着。婚后燕妮不仅承担起家庭生活的重担，还替马克思抄写几乎所有潦草不清的手稿，使得马克思能集中精力领导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和进行艰苦伟大的理论著述。在革

命遭到镇压的时候，马克思被逮捕，燕妮也被投进监牢。反动政府的迫害，丝毫没有动摇燕妮的革命意志。出狱后，燕妮跟随马克思又走上了新的征途。十九世纪五十年代马克思和燕妮在伦敦的生活是悲惨凄凉的，一贫如洗。在那些日子里，饥寒、疾病，一个接一个地袭来；面包师、蔬菜贩，肉商，房东，象走马灯似地逼着讨帐。药，没钱买；信，有时没有邮票寄；出门没有外衣穿，燕妮连她的最后一条“自由裙”也拿去当掉了。甚至孩子死了，没有钱买棺材埋葬。面对这样贫病交困的艰难生活，马克思和燕妮表现出了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坚强意志。他们之间没有任何悔恨，从不互相埋怨，而是互慰互勉，互助、互让，互敬互爱。马克思和燕妮这种崇高的无产阶级爱情观，正是他们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度过艰难岁月的力量源泉。燕妮说过：“痛苦可以锻炼一个人，而爱则给我们以支持”。这个爱，即有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爱，对美好人生的爱，也包括他们相互间的爱。他们的小女儿爱琳娜谈到父母的爱情生活时写道：“整整的一生中，不论在幸福的时刻或在困苦的日子里，爱情和友谊始终联系着他们，他们从不知道动摇和疑虑，他们互相忠爱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甚至死亡也未能使他们分开。”爱琳娜对她的亲爱的父母的爱情还作过这样的评价：“没有燕妮·冯·威斯特华伦，那末卡尔·马克思也就不成其为马克思。这决不是夸大。两个生命（两个卓越的生命）能结合得如此紧密，互相取长补短，的确是见所未见的。”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忠贞和崇高理想，使两个卓越的生命紧密结合在一起，而他们的爱情又为人类的崇高事业而燃烧，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马克思和燕妮，是我们用无产阶级爱情观，处理恋爱、婚姻问题的楷模。

我们有些青年，缺少无产阶级的爱情观，摆不正爱情的位置，认为爱情就是一切，除了爱情，就没有什么乐趣，一迈进

恋爱生活，就失去自制力，沉缅于情网之中，如醉如痴，神魂颠倒，整天苦思冥想，千方百计寻求对方欢心，把劳动、工作、学习、事业和理想抱负置之度外。有的当爱情遇到坎坷或失恋，就意志消沉，悲观厌世；有的沉迷于小家庭的四壁之中，为建设自己的安乐窝，钻营奔走。话剧《青年一代》中，林育生就是对现实生活中没有摆正爱情位置的人的写照。你看，林育生阻挠爱人，不让她服从祖国分配到边疆去工作。他对爱人说：留在上海，“白天我们一起去上班，晚上回来就听听音乐，看看小说，读读诗，看看电影，星期天上公园……”当他的爱情生活遇到挫折和不幸时，他就觉得一切都失去光辉，生活变得没有意义，而萎靡不振，消沉颓废。而当革命的需要和他个人的追求发生冲突时，他可以抛弃革命事业，做可耻的逃兵，甚至不惜出卖同志。诸如这种把爱情放到高于革命事业，高于学习和工作的“至上”的位置的人，应该对照燕妮的爱情观严格解剖自己，进而摆正爱情的位置。

我们反对禁欲主义，也反对爱情至上。爱情不是人生第一位的，它不能制约事业，而是应该服从事业，服从革命利益，这才是一个革命者对待爱情的正确态度。

十九世纪匈牙利的诗人裴多芬的著名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他是把祖国的自由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上。爱情价虽高，但是与祖国自由发生矛盾时，即刻毫不犹豫地抛弃它，去为祖国的自由而斗争。辛亥革命中的林觉民，当时他参加广州起义，被捕就义。在他就义前写给妻子的一封信中有这么一段话：“吾爱汝之心助天下爱其所爱，所以最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肯吾此心，于啼泣之余，和天下为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许多革命先烈把爱情看成是整个社会革命的附属，在革

命的危难时刻，为了革命的事业，为了人类的解放，宁愿玉碎而保持对党、对人民的忠心，不愿瓦全而求得那微不足道的妻子之情。在大革命时期，陈觉烈士在就义前写给妻子的信中说：“回忆我俩在苏联求学时，互相切磋，互相勉励，课余时间闲谈琐事，共话桑麻，假期中或滑冰或避暑，或旅行或游历，形影相随。及去年返回国内，你过家门而不入，与我一路南下，共同工作。你在事业上与学习上所给我的帮助，是比任何教师任何同志都要大的，尤其是前年我本已病入膏肓，自度必为异国之鬼，而幸得你的殷勤看护，日夜不离，始得转危为安。那时若死，可说是轻于鸿毛，如今之死，则重于泰山了”。

“谁无父母，谁无儿女，谁无情人，我们正是为了救助全中国人民的父母和妻儿，所以牺牲了自己的一切。我们虽然死了，但我们的遗志自有未死的同志来完成。”一九二七年底，爆发的广州起义，赤卫军总指挥周文雍和他的助手陈铁军，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产生了真挚的爱情。可是，由于处在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的环境下，他们废寝忘食地为党工作，还没来得及互相表白，就被捕了，直到慷慨就义时，他们在刑场上宣布举行“婚礼”。反动派的枪声作了他们结婚的“礼炮”。为了阶级和民族的解放，两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就是这样怀着对敌人无比仇恨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而壮烈牺牲。

我们从革命先烈的爱情中不难看出，爱情同革命相结合，可以产生一种特殊的力量，有了这种力量，当爱情与革命利益发生矛盾时，可以毫不犹豫地抛弃它，为祖国，为革命利益而斗争，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正如胡耀邦同志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坚持两分法，更上一层楼》一文中指出的：“健康的爱情，从根本上来说，应该是同革命事业相一致的。一个革命者，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社会主义的事业，

在必要的时候，完全可以牺牲个人的爱情，以至于生命。”

青年朋友，在现实生活中，大凡有为者，都是摆正爱情的位置，使爱情从属于革命事业，进而促使他们成就了一番伟大的事业。你看，彭加木的爱情生活不正是这样吗？彭加木在结婚之后，小家庭与事业发生尖锐矛盾，一九五六年，彭加木主动要求参加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队，赴边疆考察。此时，他已有了一个可爱的男孩和女孩，爱人的身体又不好。但是，他把爱情摆到正确的位置，以祖国的科学事业为重，毅然离开了爱人和孩子，告别了大上海。从此，他把边疆当作第二故乡，先后去新疆十六次，最后把宝贵的生命献给了边疆，献给了科学事业。彭加木以革命利益为重，是不是就没有爱情呢？不，他对爱人和孩子非常挚爱，每次回家，不忘给爱人和孩子带来新疆的哈密瓜或者海南的椰子。只是当爱情与事业发生矛盾时，他能正确的把事业放在第一位。他对爱人的态度诚如宋朝诗人秦观在《鹊桥仙》一词中所赞颂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我们再讲讲女排名将孙晋芳和她的爱人江伟光的爱情故事：一九八〇年四月，孙晋芳与江伟光定情分手时，孙晋芳把一块闪着金光的奖牌送给了江伟光，这金牌记载着姑娘的汗水和艰辛，它闪耀着为国争光的自豪，它寄托着一片脉脉深情。孙晋芳和江伟光恋爱两年多，只见过几次面，他们只得靠书信往来，互相倾诉心曲，倾诉着爱情的渴慕和对明天的憧憬。他们没有感到惆怅，反而觉得他们的爱情生活是充实的。这两年之中，中国女排与美、日等世界劲旅频频交锋，战绩辉煌。三届世界杯赛结束后，孙晋芳请假与江伟光一道去南昌探亲。江伟光的妈妈想：“伟光和晋芳都是二十六岁的人了，这次来南昌，让他们结婚。”许多人关注着孙晋芳的南昌之行，

他们猜测评断，准是孙晋芳“隐退”了，回南昌结婚。孙晋芳一到南昌，关心她的人们询问起她的婚事，孙晋芳笑着说：“关于结婚的事，我们还没有列入计划。要创造超人的成绩，就得付出超人的代价。夺冠军难，保冠军更不容易。我们决心让婚事服从祖国的安排，等我退出排坛，再考虑结婚。”孙晋芳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还有，“事业夫妇”不正是事业把他们紧紧联结在一起吗？是用爱情促进了他们的事业，又是用事业巩固和发展了他们的爱情。北京大学教授，化学家傅鹰和张锦，致力于教学和科研，晚上回家“各据一方”，伏案工作，直至夜深，他们不愧为“不倦的科学夫妇。”

青年夫妇王健和朱宁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他们互相勉励，共同学习，奋斗七年，双双考上了研究生。

“择偶须谐千秋业，爱有源头情不竭。”在事业上比翼齐飞的佳偶，爱情有助于立业。只有摆正了爱情的位置，自觉地使爱情从属于革命工作，并且处理得宜，持之有度，才能使青春年华放出灿烂的光彩。只有把爱情之花植根于革命事业这块沃土上，用忠诚的心血来浇灌，才会开放出美丽的花朵。

切忌过早恋爱

青年朋友，爱情是人的生活内容之一，适时地恋爱，可成为前进的动力，过早的恋爱，可成为前进的阻力。我们要切忌过早恋爱，应当在年龄适当的时候再谈恋爱，使恋爱成为学习、工作、生活的动力。

我们有些青年过早谈恋爱，只凭一时的感情冲动，选择了对象，确定了关系。可是等到年龄适时，思想也成熟了，有了自己看人的标准时，发现当初选择的对象并不是自己的意中人，自己苦恼，也影响对方的情绪。有的因过早谈恋爱，促使过早结婚，由于思想准备不够，经验不足，经济条件也不能自立，婚后被家务琐事缠住，工作上放不开手脚，原来幻想中的美满小家庭变成了自己背上沉重的包袱。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青少年在中小学时期就开始谈恋爱，分散了精力，耽误了宝贵时间，使学习荒疏。因政治思想还不成熟，对在恋爱中遇到的挫折，不仅不能正确对待，有的还酿成了严重后果。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不妨讲个早恋的悲剧。报载，十七岁的中学学生吕德利和同班一个十六岁的女同学谈“恋爱”，遭到拒绝后，他残忍地用刀将女方刺死。吕德利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吕德利原是通化市铁厂镇洗煤厂中学高中二年级学生，他虽然学习基础较差，但升入高中后，学习很努

力。他的学习成绩在普通班里是前几名，并能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和劳动，很快就加入了共青团组织，还先后担任了副班长、团支部委员，被评为“三好学生”。但是，吕德利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下，过早谈恋爱，逐渐走上了歧途。原来吕德利不加选择地阅读书刊、杂志，他自己还买了西方“爱情诗选”等书籍。他吸收了其中不少消极东西，因而使他的思想逐渐向坏的方面发生变化。他赞同“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大家”的人生哲学，感叹人生寂寞，想要从所谓的“爱情”中寻求安慰和“借取前进的动力。”于是在一九八一年六月，吕德利开始追求同班一名女同学，提出要“处对象”。这个女同学也是班级里学习较好的学生，共青团员，语文科代表，比他小一岁，吕德利约定她每周六单独见一次面，风雨无阻。女方的家长知道后，担心他们过早谈恋爱影响学习，不同意他们继续相处。两个月后女方便提出要解除同吕德利的“恋爱”关系。在所谓“爱情”的海洋里迷蒙着的吕德利并不甘心就此終了，仍然死死追求这个女同学。他不断地给她写信，甚至割破手指写血书盟誓。吕德利由于“失恋”无心学习，课业成绩一落千丈。他感到升学无望，就业无门，对前途失去信心，产生了悲观厌世和报复心理。由于吕德利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和占有欲不断膨胀，终于走上犯罪的绝路，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残忍地用尖刀将女方刺死。我们从这个早恋的悲剧中不难看出，早恋，特别是在中小学时候谈恋爱，不仅影响学习，而且还会在情网中不能自主，被碰得头破血流，甚至毁掉自己的青春。别林斯基说过：“如果我们生活的全部目的仅在于我们个人的幸福，而我们个人幸福仅仅在于一个爱情，那么生活就变成一片遍布荒茔枯冢和破碎心灵的真正阴暗的荒原，变成一座可怕的地狱……”鲁迅也曾告诉天真幼稚的青少年：“不能只是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

人生的意义全盘疏忽了。”这很值得早恋的中学生深思。

青少年朋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新一代的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我们一定要警惕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垃圾对自己心灵的污染，特别值得警惕的是，不能看社会上流传的一些坏书和学唱黄色歌曲。有的青少年由于放松警惕性，在精神污染的糖弹面前吃了败仗，当了俘虏。我们要从别人沉痛的教训中清醒头脑，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

中小学时期，是长身体，学知识，学本领的时期，是处于开发智力培养能力的最好时期。每一个人都应珍惜自己的这一黄金时代。

我国著名文学艺术翻译家傅雷在给儿子傅聪的信中这样写道：“我想你心目中的上帝一定也是巴赫，贝多芬，萧邦等等第一，爱人第二。既然如此，你目前所能支配的精力与时间，只能贡献给你第一个偶像，还轮不到第二个神明。你说是不是？”傅雷这段话真是语重心长，启迪我们青年人要珍惜青春年华，不要过早谈情说爱，要把精力放在事业上。古今中外，年轻有为者，大都是“惜取少年时”。经受一番艰苦磨炼的列宁，二十三岁就成为彼得堡马克思主义者公认的领袖；聂耳二十二岁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曹禺二十三岁发表成名作——话剧《雷雨》；华罗庚十九岁发表数学论文，二十五岁已成为世界著名数学家；郝建秀十九岁创造细纱工作法。再看，唐诗人李贺十八岁时写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的名句；伽俐略十七岁发现钟摆原理；牛顿二十三岁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他们能如此大器早成，是把精力过早的放在谈恋爱上了吗？不是的，是把精力放在事业上。

当然，人到了一定年龄，总要谈恋爱的，任何人都不能剥夺享受爱情的权力。我们讲的是不要过早谈恋爱。这除了有年龄

因素外，还应有一定的辨别能力，能够以理智驾驭感情，具有妥善处理主从关系等能力。待到年龄大些，自己的政治思想比较成熟，社会经验比较丰富，经济上基本可以独立的时候才可以谈恋爱。

让我们学会驾驭生活，趁风华正茂之时，集中精力学习、工作，为将来获得生活的幸福创造条件吧。

选择恋人不能只看外表

青年人谁不想找个漂亮的爱人呢？在爱情上，把对方容颜做为恋爱的一个条件是很自然的。但是，选择恋人可千万不能只看外表，把美貌与否当成唯一的条件。契可夫说过，“面貌的美丽当然也是爱情的一个因素，但心灵与思想的美丽才是崇高爱情的牢固基础。”托尔斯泰也有这样一句话：“人并不是因为美丽才可爱，而是因为可爱才美丽。”这就是说，找对象，谈恋爱考虑容貌，合于常情。但是，心灵美与外表美相比，心灵美不能不占着首位。

心灵美是指一个人要有崇高的理想，高度的思想政治觉悟和高尚的品德情操的修养。一个人外貌平平，或稍有缺陷，但心灵美，同样值得人们爱慕。德国著名的音乐大师贝多芬是个矮个子，大脑袋，扁鼻子，脸上还有几颗麻子。虽然他外貌不美，可是每当听到“贝多芬”三个字时，不管用英语，德语，还是汉语，都觉得那么悦耳。联想他的“英雄交响曲”、“田园交响曲”等世界名曲，对贝多芬无不倍加敬慕。电影《巴黎圣母院》中的敲钟人卡西摩多，虽然生就一副又丑又怪的面孔，但心地善良，而富洛娄神父尽管长的白净端庄，可内心却十分邪恶。至于那个太阳神，不可不谓“美男子”，然而，漂亮的面庞毕竟掩盖不了他那卑鄙丑恶的灵魂。我们要端正对美的认识，透过外